

“十三五”时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短板”及对策

THE SHORT SLABS OF
THE MEASURES TO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张平 王宏森 张自然／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及对策/张平, 王宏森, 张自然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097-8387-0

I. ①十… II. ①张… ②王… ③张… III. ①小康建设-研究-中国-2016~2020 IV. ①F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8919 号

“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及对策

著 者 / 张 平 王宏森 张自然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于 飞

责任编辑 / 陈凤玲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387-0

定 价 / 30.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位学者配合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就国家实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进行了多项专题研究，包括《“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趋势和思路》《“十三五”及2030年发展目标与战略研究》《“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及对策》《“十三五”时期老龄化形势与对策》《“十三五”时期促进服务业发展改革研究》《步入“十三五”的财税改革》《“十三五”时期劳动力市场转型对策研究》《“十三五”时期工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与政策》《“十三五”时期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思路》《“十三五”时期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十三五”时期资源环境发展战略研究》《“十三五”时期收入分配问题及对策研究》《“十三五”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环境和重大问题研究》。

这些报告是国家级智库深度剖析“十三五”规划、参透中国未来发展大势的精品著作，深入分析了未来五年以及更长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趋势和问题，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思路 and 对策，对于我们理解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新形势、新情况、新挑战、新趋势，对于我们思考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选择，对于我们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和战略部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摘 要

从总体上看,“十二五”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取得了很大进展,“十三五”经济增长年均达到 6.5% 就能实现 2020 年比 2010 年翻一番的总量目标,但趋势性、结构性、机制性三大方面的短板不容忽视。一是经济效率低下的短板,如投资边际效率下降,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均出现放缓,从而引起经济增长速度趋势性下滑。二是结构性的短板,长期赶超造成的“结构性扭曲”带来了诸如消费率持续疲软,初次分配中劳动者份额低位徘徊,“空气质量”“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引起较大的民生关切。三是“机制”上的短板,如收入分配中的 GINI 系数、城乡收入分配差异、区域不平衡虽然在缩小,但很多是靠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实现的,没有完成太多的机制性变革,特别是贫困问题依然难以消除;城市化率不稳定,城乡一体化的机制不完善;全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仍在推进中,很多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体制仍是短板。上述短板已经成为“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直接风险,如果经济失速与失业率上升过快,与机制不完善导致的分配差距再次拉大,以及金融的过快膨胀和外部冲击交织在一起,很可能会激化经济社会矛盾甚至引发危机。因此未来五年政策的核心是防止经济增长趋势下滑和外部冲击带来的总量风险,同时应注重消除结构扭曲带来的初次分配偏低、非农就业率低引起的消费不足、空气污染等常年积累下来的弊端,积极按新千年目标中的每天 1.25 美元的标准彻底消除贫困,通过体制建设来保证机制性地克服短板问题,从根本上建立一个自主决策、风险分散、有序竞争、普遍分享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目 录

- 一 “十二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存在的短板 / 001
- 二 “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能面临的风险 / 009
- 三 克服短板，防范风险，全面建成小康之策 / 012

小康社会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能绕开的必经发展阶段。这一重要目标具有动态探索的特点。1982 年中共十二大提出“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2002 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确立 21 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这看作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2012 年中共十八大又做出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部署。2015 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准备开启“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一年。评测“十二五”全面实现小康目标情况，检视其中的短板和风险问题，才能未雨绸缪找寻对策以按预定进程实现国家的小康社会伟大战略。

从总体上看，“十二五”期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为“十三五”经济增长打下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十三五”经济增长年均达到 6.5% 就能实现 2020 年比 2010 年翻一番的总量目标。国家统计局和《小康》杂志社公布的“十二五”各类综合指标，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污染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也有了重大转机。但从经济增速趋势以及金融债务压力来看，风险仍较高，特别是中国将更全面地融入世界，也存在着受到外部冲击的风险。“十二五”期间虽然在短板上出现转机，但收入分配、污染问题更多的是政策平抑的结果，不是制度机制保障下的趋势必然改变。展望“十三五”，核心是防止经济增长趋势下滑和外部冲击带来的总量风险，更应该注重克服短板的结构与体制机制建设，才能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把“构建发展新体制”作为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一项要求。这既是达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也是能够实现五大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体制机制保障。本文分析“十二五”时期的机制体制问题，揭示“十三五”的相应挑战，提出防范风险、完善体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一 “十二五”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存在的短板

“十二五”期间中国 GDP 年均增长达到 7.86% 的水平（2015 年按 7% 计

算),为“十三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三五”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5%就能完成比2010年翻一番的总量目标。在经济增长的同时:①我国收入差距缩小,更多地实现了分享,2010年后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收入差异也在缓慢缩小,社保覆盖水平大幅度提高。②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城乡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认为居民食物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生活水平就越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标准,恩格尔系数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我国2013年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农村居民为37.7%,恩格尔系数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而缩小,均达到小康水平或富裕标准。③城市化快速发展。预计“十二五”城市化率将超过56%的水平。从《小康》杂志公布的“小康指标”看,以人为本的社会、文化、安全、生活质量、人的素质等多个统计指标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十二五”期间也明显存在着趋势性、结构性和机制性的短板,具体如下。

(一) 经济增速趋势性下滑的短板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等都出现了趋势性下滑。这些趋势性下滑将直接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趋势明显。尽管“十二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86%,但趋势不容乐观,2011年经济增长9.5%,2012年、2013年增长7.7%,2014年增长7.4%,2015年预计增长7%,以此连年下滑趋势推延下去,“十三五”经济增长完成年均增长6.5%的水平有一定的难度。

第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持续下降。随着“十一五”时期到“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的减速,2011年以来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幅也在持续下降(见表1),预计2014年、2015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为7%,降至个位数。分产业看,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下降,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也出现下降的趋势。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贡献也在持续下降,它对经济的贡献从原有的25%下降到17%左右的水平。

表 1 2006 ~ 2013 年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情况

单位: %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	13.05	14.12	12.18	11.17	12.65	11.62	10.21	8.05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第三,人力资本增长放缓。一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教育实现,并把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测度,Barro 和 Lee (2013) 提供了世界各国人口教育水平的详细数据。把中国 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比较(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而且与诸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存在不小的差距。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幅度看,1970 ~ 2010 年,拉美 9 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中国分别增长了 1.1 倍、1.7 倍、1.5 倍、0.8 倍、2.2 倍、2.9 倍、1.1 倍,中国人力资本增幅相对较小。

表 2 部分国家(地区) 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 年

年 份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美 国	10.8	11.5	12.0	12.1	12.2	12.6	12.6	12.9	13.2
日 本	7.8	8.4	9.1	9.6	9.8	10.5	10.9	11.3	11.6
拉美 9 国	4.0	4.2	4.6	5.3	6.0	6.7	7.3	8.0	8.5
印度尼西亚	2.8	3.2	3.6	3.9	4.2	4.6	5.2	6.4	7.6
马来西亚	4.2	4.8	5.8	6.7	7.0	8.4	9.1	9.7	10.4
菲 律 宾	4.7	5.5	6.2	6.6	7.1	7.6	7.9	8.2	8.4
泰 国	2.5	3.0	3.6	4.2	4.9	5.5	5.7	7.0	8.0
印 度	1.6	2.0	2.3	2.9	3.5	4.1	5.0	5.6	6.2
中 国	3.6	4.1	4.9	5.3	5.6	6.3	6.9	7.3	7.5

注:拉美 9 国为人口加权平均数,9 国分别是乌拉圭、秘鲁、巴拉圭、墨西哥、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智利、巴西和阿根廷。

资料来源:Barro & Lee (2013)。

进一步,若把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GDP进行比较,可以得到更有意义的启示。从Barro和Lee(2013)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中,抽取各国2010年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GDP序列,制成散点图(见图1):可以看出,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大多数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而且低于很多人均GDP较低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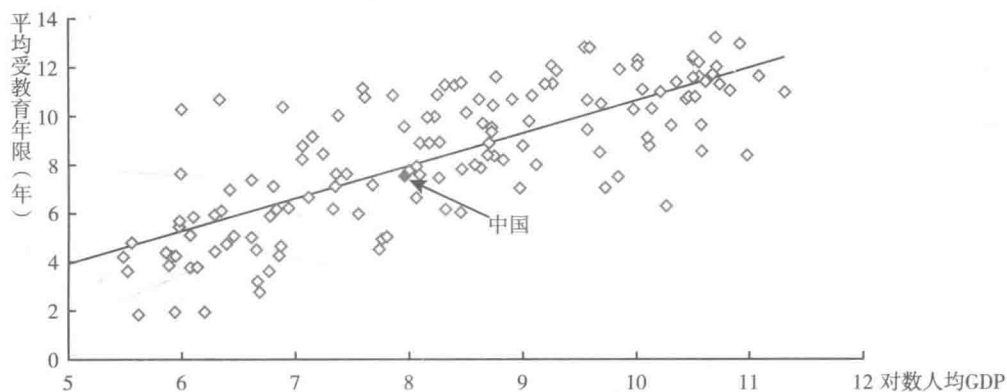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与144个国家人均GDP与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比散点图

注: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统计口径为15岁以上人口。

资料来源:Barro & Lee (2013)、2014年世界发展指数(World Bank, 2014)。

上述国际比较说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培育这两个对于内生增长极为关键的因素,在中国工业化结构性加速时期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中的作用是相对不显著的。这种局面如果不能予以调整,很难抵消经济过快减速风险。

(二) 结构性的短板

主要指经济社会分配中,仍有多处于结构扭曲的短板,且未得到全面矫正,具体如下。

第一,需求结构中,“十二五”时期消费率持续走低,1978~2013年中国的消费率呈下降趋势,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消费率低于50%,“十二五”期间仍处在历史最低位。原因很多,表面原因是投资过快,根本原因是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不快(见表3)。

表3 1978~2013年中国的消费率

单位: %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消费率	62.1	64.4	65.5	67.1	66.5	66.4	65.8	66.0	64.9	63.6	63.9	64.5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消费率	62.5	62.4	62.4	59.3	58.2	58.1	59.2	59.0	59.6	61.1	62.3	61.4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消费率	59.6	56.9	54.4	53.0	50.8	49.6	48.6	48.5	48.2	49.1	49.5	49.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二,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所占份额低位徘徊。要素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上下的低位,到“十二五”期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再次低于50%,2012年为45.59%(见表4),初次分配劳动报酬低与非农就业比重低高度相关,农村仍然有大量隐蔽性失业。

表4 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所占份额

单位: %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劳动报酬份额	52.79	53.14	52.38	51.38	51.45	50.92	49.62	45.51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劳动报酬份额	41.40	40.61	39.74	43.18	46.62	45.01	44.94	45.59

注: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仅提供2012年的分省份的劳动报酬。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也处于历史低位。从1997年的13.63%上升到2001年的15.72%,2001年达到最高,此后固定资产折旧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直到2012年的12.86%,为近十几年的新低。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开始持续升高,直到2007年达到最高,为31.29%,此后基本逐年下降,到2012年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

25.66%。

生产税额占 GDP 的比重从 2006 年后逐年上升,直到 2012 年的 15.89%,生产税额占 GDP 的比重变化方向和固定资产折旧占 GDP 的比重变化方向相反。

第三,从生活质量中的分类看,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是“十二五”期间的短板。2014 年我们组织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对食品安全满意度的调查发现:35 个城市居民除厦门外,对食品安全均表示不满意。

后来我们增加了一项专项调查,询问受访者“您认为以下哪项①食品安全②空气质量③物价④交通状况,对您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受访者选择每个答案的比例,见表 5。

表 5 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调查结果

单位: %

地 区	食品安全	空气质量	物价	交通状况
石 家 庄 市	22.22	50.81	19.10	7.87
北 京 市	28.07	46.37	18.02	7.54
宁 波 市	28.30	43.94	19.95	7.82
天 津 市	28.85	43.54	18.58	9.03
郑 州 市	26.88	42.05	21.16	9.90
南 京 市	30.83	41.63	20.63	6.92
济 南 市	27.71	40.71	22.45	9.13
上 海 市	30.36	38.60	20.88	10.16
杭 州 市	32.21	38.38	17.09	12.32
成 都 市	32.78	37.09	22.28	7.85
西 安 市	33.49	36.51	21.63	8.37
太 原 市	33.04	36.38	23.21	7.37
乌 鲁 木 齐 市	32.43	35.59	22.07	9.91
合 肥 市	34.42	35.51	20.25	9.81
武 汉 市	28.81	35.40	23.92	11.86
广 州 市	31.02	34.49	25.63	8.86
青 岛 市	30.47	32.13	27.98	9.42
长 沙 市	37.54	31.87	21.67	8.92
重 庆 市	33.10	31.49	23.55	11.86

续表

地 区	食品安全	空气质量	物价	交通状况
长 春 市	33.79	31.32	23.08	11.81
沈 阳 市	35.66	31.01	25.58	7.75
哈 尔 滨 市	35.12	29.13	28.72	7.02
大 连 市	34.40	28.01	28.01	9.57
福 州 市	37.15	27.65	23.18	12.01
厦 门 市	34.47	26.89	25.00	13.64
南 昌 市	37.73	26.60	22.06	13.61
银 川 市	37.50	25.96	31.73	4.81
昆 明 市	37.60	25.38	22.52	14.50
呼和浩特市	34.03	25.00	26.04	14.93
西 宁 市	28.99	24.64	32.61	13.77
深 圳 市	40.14	23.45	28.06	8.35
兰 州 市	31.10	22.26	30.79	15.85
贵 阳 市	28.15	21.73	27.16	22.96
南 宁 市	32.11	21.28	34.43	12.19
海 口 市	40.00	20.95	26.67	12.38
全 国 平 均	31.89	34.71	23.18	10.21

资料来源：首都经贸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生活质量指数”联合调查，其结果发布于各年度蓝皮书。

这一专项调查显示，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最重要的因素是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35个城市中，17个城市的受访者把空气质量视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18个城市的受访者把食品安全视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在所有受访者中，认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分别是空气质量（34.71%）、食品安全（31.89%）、物价（23.18%）、交通状况（10.21%）。从35个城市的平均值来看，认为空气质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食品安全次之，物价排第三位，交通状况最后。显然，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民生发展中的最大短板。

（三）“机制”上的短板

虽然有很多发展中的短板看似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制度机制的保

障很不稳定，因此调整机制的短板才是根本。

第一，收入分配机制。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5 年 1 月 20 日发布数据显示，2003 ~ 2008 年，中国基尼系数持续上升，而 2009 年达到高峰后，“十二五”基尼系数逐年回落，2014 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469（见表 6）。这是基尼系数自 2009 年来连续第 6 年下降，但这一数字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 0.4 的贫富差距警戒线。

表 6 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单位：%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基尼系数	0.479	0.473	0.485	0.487	0.484	0.491	0.49	0.481	0.477	0.474	0.473	0.46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分配差异、区域平衡近年来都在缩小，但很多是靠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实现的，没有完成太多的机制性变革，短板的持续改善仍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从中国反贫困来看，其成就不可谓不巨大。但是，按国内标准看仍有 7000 万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以此标准在 2020 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未来五年的反贫困任务依然十分繁重，但反贫困不只是依靠政府或国际援助，而更应通过教育培训、稳定就业、提高收入、降低生活压力等方面来帮助他们脱困。

第二，城乡一体化机制很不完善。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化率预计超过 56%，取得城市化发展决定性的一步。但城市化仍然争议颇多，特别是户籍带来的“城市化”挑战，以户籍人口计算城市化率远低于 50%，而以城市常住人口能享受城市社保覆盖也要低于 50%，因此城市化率不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机制不完善，人们无法享受城乡统一的普遍化服务，特别是基本的医疗服务都难以满足。人口流动受到户籍限制仍处于分割状态，行政区划和城乡分割仍难突破，在城乡一体化机制上不完善。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仍未成熟。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仍没

有发挥，国企改革仍在起步阶段。宏观调控体系改革也刚刚展开，利率、汇率市场化决定刚刚启动，财政税收综合改革“十二五”完成了全面“营改增”，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高企等问题没有取得根本性改善。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也仅仅是起步运行。总之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仍在推进中，很多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体制仍是短板。

二 “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能面临的风险

“十二五”为“十三五”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仍存在着趋势性、结构性和机制性的短板需要在“十三五”期间克服，很多短板的挑战已经成为“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直接风险。特别是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趋势性减速、结构调整不利、金融风险累积、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都可能互相交织起来引发经济社会矛盾甚至危机。“十三五”无疑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防范风险是重要的。

（一）经济失速与失业率上升过快的风险

2008年伴随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普遍的高速增长期也戛然而止。中国通过“4万亿元”的反危机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在2010年回到了两位数10.4%后，2011年经济开始调头向下，增长速度为9.3%，2012年、2013年降到7.7%，2014年GDP增速进一步下滑，全年GDP同比增长7.4%，2015年预计只有7%，趋势性下降非常严重。经济增长下降伴随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累积速度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也就是说当前的经济下滑趋势中并没有新的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本的上升，仍严重地依赖投资。“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的区间会进一步下移至5%~7%，年均增长达到6.5%就能实现“翻两番”，但也要充分防范经济下滑的“顺周期”紧缩效应，防止经济增长失速造成经济动荡的风险。

建成小康社会需要稳定的就业作为基石，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保证。如果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竞争和产能过剩日益加剧，会造成一些实力比较弱的中小企业不断减员限产，企业效益下滑；社会投资总量的减少会使

社会就业岗位大打折扣，大量的低收入阶层失去赖以谋生的工作，生活陷入困境；社会经济增速放缓，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也会减慢，进而政府对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减小。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过程。从总量看，“十二五”期间城镇新增就业规模持续增长，每年就业指标都能超额完成，2014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创出21世纪以来的最高值。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第一，新增就业同比增幅缩小，从2010年的5.99%下降到2013年的3.48%，2014年较2013年增幅不到1%。第二，从年龄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16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较上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则进一步减少了371万人。相比需求因素而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更稳定和持久。第三，由于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结构性失业的苗头已经显现，未来仍将对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构成挑战。第四，随着产出下滑，近年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上升对利润空间压缩的影响程度会更大，由此带来的负反馈效应更为严重。

（二）金融的过快膨胀与外部冲击风险

与制造业景气显著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中国的货币金融资产扩张速度很快。我们根据IMF和中国央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得知，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保持了相对较高的货币扩张速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2009年为60.6万亿元，2014年为122.8万亿元，翻了一番。由于货币供应的相对过快增长，M2与GDP的比重也显现上升态势，2009年为177.7%，2012年为187.7%，2013年达到峰值194.6%，2014年略有回落，但仍高达193.1%。

货币的脱实向虚趋势也很明显。2009~2014年，中国金融资产从121万亿元增至241万亿元，绝对数量翻了一番，年复合增速达到12.2%，占GDP的比重从354%增至378%，增长了24个百分点，这与全球金融最发达的美国（金融占GDP约410%）已相差不远。在构成金融资产三大类的银行资产、股票、债券中，银行资产的增幅最大，2009年占GDP的比重为231.1%，2013年达到峰值266%，2014年略有下降至264.5%，2009~2014年增加了33.4个百分点。债务证券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51.3%增至

2014 年的 56.1%，增加了近 5 个百分点。股票市值占 GDP 的比重则从 71.6% 降至 2014 年的 58.2%，减少了 13.4 个百分点。2009 年，银行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为 65%，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分别为 73.1%、73.8%、69.8%。未来 5 年，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任务依然很重。

近年来，实体经济通缩的影响向信用和负债表等方面传递，金融风险不断累积。企业家对增长前景缺乏信心，投资预期下降，企业资金主要进行财务成本调整，而不用用于投资，大部分资金流向基建、地产和其他高杠杆或长周期部门，形成资金沉淀，周转率大幅下降。银行体系低成本负债资源趋于枯竭，近年来只能用更短的高成本负债（同业 + 理财）去支持信用资产，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的脆弱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07 ~ 2012 年中国的非金融公司债务率、家庭部门的债务率（各自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上升较快，分别增加了 38 个百分点、11 个百分点，此格局与发达国家的私营部门去杠杆化、自我修复和再平衡趋势正好相反。而政府部门的潜在债务压力也不小，根据审计署报告，截至 2013 年 6 月底，中国政府的债务与或有负债达到了 30 万亿元。

金融的全面膨胀，拉高了经济杠杆和资产价格水平，支撑了经济增长。但同时，货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率在降低，并且不断加剧结构的不平衡，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当前的很多宏观政策希望抑制货币信用膨胀，但成效不大，金融继续膨胀，其政策效果恰恰直接打击了实体部门，将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的裂口越拉越大。

中国已是全面开放的大国经济，除了单纯贸易盈余波动的影响外，“十三五”期间，随着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外资流动、金融市场恐慌和贸易摩擦等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国际经济周期所带来的外需冲击也不可低估。目前全球分工体系仍在重构中，未来 5 年将是充满摩擦的调整期。预期在“十三五”期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将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为负值，资本流动的逆转也可能成为新常态。

（三）机制不完善导致分配差距再次拉大和社会分化的风险

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另一项基石和重要保障。如前所述，我国收入分配不

合理问题十分严重，反映收入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近年来已经逼近 0.5 的警戒线。有研究测算中国收入最高 10% 家庭的人均收入甚至达到收入最低 10% 家庭的五六十倍，严重影响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源在于两大方面：第一是政府及其代理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重较大。居民收入份额在近十余年间下降了 10 多个百分点，这是总需求中消费率很低而投资率很高尤其是政府投资高企的最根本原因。由于国民财富以过高的税、费、经济租、非法收入等形式向政府及其各类代理人迅速集中，居民的收入提高难乎其难。

第二是城乡分治造成的“社会二元结构”。城乡分治把 13 亿人口变成了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在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呈现不平等待遇。不同的身份，使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参与市场竞争在起点上就变得不平等，在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就业状态、创业环境等方面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差距。

贫富差距关乎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影响了社会稳定。不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发展动力的需求和投资都会有相应的消极影响，也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抵触情绪。虽然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导致种种不满，但在经济蛋糕不断做大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尚可容忍。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减速，在没有足够的增量可供分配的条件下，弱势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会更不稳定，而在资产升值的情况下则加剧了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随着低收入群体被弱化，其不满就会强烈表达出来，一些事情处理得不公平或不透明成为其宣泄负面情绪的突破口，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贫富差距拉大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萎缩，而中产阶级向来是政治发展的基石。在许多国家，街头政治逐渐取代了议会民主，保护主义及排外情绪挤压了多边合作，在社交媒体的协助下，所谓的“暴走快闪”迅速蔓延，很可能演变成群众运动，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治生态。

三 克服短板，防范风险，全面建成小康之策

未来 5 年是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机制问题能不能解决好，风险因素能不能控制好，决定了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